第 62 卷 第 3 期　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　Vol.62, No.3
2025 年 5 月　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(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)　May 2025

我 与 北 大 学 报

为赓续北大学报传统尽绵薄

龙 协 涛

(北京大学 中文系, 北京 100871)

新时代新征程,在学术期刊坚持方向立刊、质量强刊,正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今天,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迎来了创刊 70 周年! 这是一件值得纪念和庆贺的事! 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张亮丽学术名片,作为北京大学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载体,北京大学学报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,赢得学术界、学报界的赞誉。作为曾在学报长期工作过的一名老兵,高兴地看到北大学者大力支持本校学报,学报负责人薪火相传,一棒又一棒地接力,不断开拓刊物的新境界,不断取得新成绩。值此学报 70 周年刊庆之际,我乐于回忆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,谈谈自己办刊的想法,期望对梳理北大学报的文脉和传统有所裨益。

一、从北大学者身上学办刊传统

我是 20 世纪 80 年代进北大学报编辑部的,长期做普通编辑的工作。当时北大学报编辑部主任是苏志中教授。他是一位历经千难万险回国的爱国华侨,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毕业。他是我无比崇敬的领导和老师,我跟他学做人,学办刊。由于学报工作同北大学者打交道多,耳提面命,亲历亲闻,受到他们的熏陶,能够领悟大师的学问渊博与魅力。

我经历的事情比较多,其中三件事深深触动了我,从学者身上学习到北大的优良传统。

一是关于敦煌学研究的一篇批评性重磅书评。

学术刊物主要发学术论文,但也应重视发书评。在国外还有这种规定,没有书评的刊物不能算学术刊物。我看今天的高校学报,发书评很少,如果有书评大都是一片颂扬声。因此值得重提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84 年第 4 期发表周一良的《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》这件事。这是一位学术大家评论 1983 年 10 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张锡厚著的一本书《王梵志诗校辑》。周一良文章题目很温和,但实际上是一篇很严厉的批评性书评。王梵志诗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热点。郑振铎先生就是王梵志诗的研究者,曾称王梵志是“白话诗派的开山鼻祖”。20 世纪 80 年代学术思想很活跃,出版了很多好书,但赶潮流、学术质量不高的东西也开始涌现。张著由中华书局出版,著名学者、敦煌学专家任半塘、著名古典文学家余冠英分别为之作序和题写书名,著者本人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国家队的专家,似乎方方面面都为该书盖上了合格证、通行证。没想到著名学者周一良专门写了批评性重磅文章,而且又是在名刊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上发表。必须说明的是,周一良先生的文章题目并没有用“评论”字眼,而是用“几条补注”。哪里只是“几条”? 周文实际是 14 条。周先生文章指出张著对王梵志诗的解释中有对 14 首诗的解释存在重大错误,也有本属常识性的问题竟然也被弄错了。周文的纠错,不是一首诗寥寥数语,而是一般写了五六百字,有的长达千言。这件事当时在学术界掀起较大波澜。周一良文章一出,当时吹捧张锡厚著作的书评便绝迹了。作者原以为自己的著作能拿到奖,结果不但拿不到奖,反而影响到他当年的职称评定。周一良的文章一方面严格把关、毫不留情地指出张著中的错误,但遣词用语上又非常温

收稿日期: 2024-12-20

作者简介: 龙协涛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1995 年—2004 年任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主编。

和低调,不用“评论”而用“补注”。这就是北大学者的学术品格和风貌!

二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,发表理论热点中有重大突破的文章。

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,为从根本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,逐步培育市场主体和产权制度,激发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创新功能,必须有“制度性突破”的股份制改革。北大学报 1985 年第 1 期发表了光华管理学院曹凤岐副教授的文章《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》。其重大意义在于曹凤岐是当时发表研究股份制度重要文章的第一人,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 》是国内学术期刊(含重要报纸) 发表股份制创新性研究论文的第一刊。辽宁大学出版社于 1988 年 7 月出版了一本书《论财产股份制》,收录那个时期国内报刊上发表研究股份制的论文。编者郑重说明,书中的论文篇目排序是按论文首次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的。打开此书的目录,曹凤岐的文章赫然排在第一篇,后面依次排列的是王小强、曹文炼、吴稼祥、厉以宁、陈必吾、张维迎、孙学文、吴树青、蒋一苇、王梦奎等人的文章。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给该书写了长篇序文,他的第一句话就说“股份制问题是我国近年来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。”刘序增加了此书的权威性。此书很重要,见证了历史,为后来研究股份制改革的人提供了第一手材料。

因发表这篇文章,北大学报同曹凤岐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和友谊。曹凤岐后来长期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始副院长,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他就股份制问题写了二论、三论、四论直到十论的重要文章,分别陆续发表在北大学报 1989 年第 1 期、1993 年第 3 期、1996 年第 2 期……北大学报 2005 年第 6 期刊载曹凤岐的文章题目是《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研究——十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》。从 1985 年到 2005 年,悠悠 20 年岁月,一位作者就同一课题,以掘一口深井的意志,写出 10 篇关联性的高水平论文,而且又都是发表在同一家高水平的期刊上。这是一个不多见的典型事例,值得从作者和编辑两个视角进行研究。我和曹凤岐同是 1964 年入北大的,此事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。我感受到做编辑工作的价值和意义,内心获得安慰和快乐!

三是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,名家的稿子也是可以退的。

金克木是北大研究梵文与印度文化的大专家,又是著名的散文家。也许因为同住北大朗润园的缘故,常被人们与季羡林、张中行、邓广铭一起称为“未名四老”。1983 年,他派人给位于未名湖畔的学报编辑部送来一篇他自己的文章,内容是讲梵文同汉语词汇的比较。鉴于金克木的名气很大,当时《读书》杂志上几乎期期都有他的文章,我考虑是可以直接安排发稿的。但苏志中主任提出学报所有的稿件都要送审,金克木的文章也不能例外。根据金克木文章的内容,他安排我送给中文系陆俭明教授审稿。我原以为这也许是走走程序,金的文章肯定最后还是要发表的。使我大吃一惊的是,没想到陆老师给出的审稿结论是退稿。我到中文系去取回稿子,当面向陆老师请教,他解释说,金克木是很有学问的人,但此篇文章不在他擅长的研究领域之内,故应当退稿。陆老师实事求是的话,他为学报严格把关,顿时令我对他肃然起敬。

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到金家送还稿子时,原以为金先生会对我发脾气,没想到他处之泰然,很谦虚地讲“我也不是每篇文章都写得很好啊!”从金克木身上我看到了学术大家虚怀若谷、为人谦和的一面。虽然是初次见面,而且是因为登门送退稿的见面,但我们之间一点也不尴尬,他仍然很乐意同我聊天。我表示要向他学习写散文,讲自己好不容易上了北大中文系,不满足于只是从事文学研究,还想搞点创作,争取写出好的文学作品。金克木先生肯定我的想法,说学报编辑部离他家很近,欢迎我常到他家坐坐。后来季羡林先生主持编辑《当代散文八大家》系列丛书,选了季羡林、冰心、汪曾祺、余光中、张中行、秦牧、金克木和余秋雨等八家。我负责编金克木卷,为此事我去金家三四次,讨论选文的篇目,讨论我写的编辑《前言》,一个原来送退稿的编辑俨然成了他的学生和朋友。此套丛书编成后由深圳海天出版社于 2001 年 5 月出版,然而金先生却于 2000 年 8 月 5 日仙逝,未看到由我选编的他的新散文集。每想到此事,心中不免总是充满深切怀念和哀伤!

以上三件事是我举的例证,从办刊的视角讲到周一良、金克木、陆俭明、曹凤岐、苏志中等名家的学问境界、精神风貌。他们是北大学者的代表,反映了北大优良的学术传统。

讲到北大的学术传统,除了讲上述三件事,我还要提三本重要期刊。一是 1919 年蔡元培创办的《北京大学月刊》,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学术包容; 二是胡适创办的《国学季刊》,主张白话,整理国故,注重实证与批判,倡导中西方法结合; 第三是陈独秀、李大钊创办的《新青年》,这本杂志不能算是北大办的刊物,但 1917 年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,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部便随之迁到北京,北大教授的骨干群体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为该刊核心撰稿人。《新青年》杂志担当启蒙与救亡,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,是中国精神界的一次壮丽日出。因此,我以为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的刊庆是从 1955 年算起,这是确定无疑的。但《北京大学学报》的文脉和学术传统源远流长,博大精深,不能只是从 1955 年开始研究,应该往上追溯到上述三本重要期刊。“求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; 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泉源。”同教育部其他名校的名刊大刊相比,光荣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学术文脉是北大学报的办刊优势。今天我们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“两个结合”思想,传承好北大学报的学术根脉和思想源泉,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就能更上层楼,实现高质量发展,不断提升学术品牌。

二、为赓续学报传统跑好自己的这一棒

1994 年春季开学,由于学报编辑部王毓钟老师身体不好,学校决定由我来主持学报的工作。当时我是诚惶诚恐,如履薄冰,如烹小鲜。基于对北大的热爱,对北大学报的热爱,我下定决心要办出刊物的新面貌、新气象。

我对办刊的执著和干劲,缘于我对学报在学校工作中的独特地位和所占分量的深刻认识。当下人们看北大,喜欢用“一塔湖图”,这成了看北大的时尚用语。塔者,象征着北大的精神高度; 未名湖者,表达的是大名无名,象征着北大思想包容和深阔; 图书馆,亚洲高校藏书最多,自然算知识海洋和学问渊薮。我在自己的《燕园赋》中也描述过此景此情:“塔挽流云,湖漾清波; 洗春色之不去,任书声之自来。”我很欣赏“一塔湖图”这个形象化的表达,但同时也非常赞同著名教育家、《资本论》的翻译者、厦门大学的老校长王亚南提出的“大学三看”:“一看教师队伍,二看图书馆,三看学报。”学报是评价一所大学的重要标尺。王亚南的话强化了我的责任意识,提升了工作的使命感。当时学校对学报很重视,实行一个重大举措,一改由分管校长审阅清样签字复印,指定著名学者黄楠森、薛汉伟两人负责审阅北大学报每一期清样。当时我同北京高校学报的负责人开会,谈到北大学报有两位知名学者负责审阅清样,有朋友对我半开玩笑地说:“北大学报好办,有双人审稿,买了双保险啊!”黄楠森、薛汉伟老师认真负责、严格把关,还经常给我出主意,增添了我办好学报的信心和底气。

我决心要对学报做一些事,但又不能等到从 1995 年第 1 期起开始实行,于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,打破惯例,决定从当年第 3 期开始尝试做一些改革。

我做了五件事:

一是换了刊物封面,要求庄重,有书卷气,体现北大特色。

二是主编写卷首语,占一页的版面,概括该期文章的要点和学术特色,引导读者阅读。遗憾的是,这一工作负担很重,花时间很多,我只坚持了两年就停止了。

三是在封二上开设“北大学人”,每期介绍北大两位学者,不只发文字介绍,还配发照片。改革后首期介绍的是季羡林和陈来,第二期介绍的是费孝通和闵维方,第三期介绍的是陈岱孙和曾毅,第四期介绍的是黄楠森和赵敦华……这个栏目的开设,也是我深受王亚南的观点影响的结果。他的著名的“大学三看”,第一看不就是“看教师队伍”吗? 到 2025 年底,此栏目将介绍 368 名北大教师,为宣传北大、促进师资队伍建设起到一定作用。

四是开设“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信息库”,到 2001 年第 4 期,该名称调整为“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

览”。每期摘登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上发表的十二三篇文章,可以了解全国学报的学术动态,扩大编辑的眼界,而不是闭门办刊。当时一位年轻作者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北大学报摘登了,他给我写信说:“看到自己文章的观点被北大学报摘登了,我比当年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还高兴!”这位作者的信,对我是个鼓舞。这个栏目现在越办越好,国内学术评价机构文献统计认可这个栏目的摘登。

五是打破本校教师一年只能在北大学报发一篇文章的不成文规定。

当时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开展很好,罗荣渠的专著《现代化新论》带动了北大的一批学者,他们突破西方中心论,现代化理论研究由“引进消化”转向“自主创新”,大有形成北大学派之势。哲学系王东教授思想活跃,一直着力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,研究中国现代化理论,先后给北大学报投了三篇研究现代化的论文。题目是:1. 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理论——兼论孙中山、毛泽东、邓小平的思想轨迹;2. 现代化求索的不惑之道——试论建国 45 年、改革 15 年的历史经验;3. 改革、发展、稳定的协调机制论——中国现代化起飞的关键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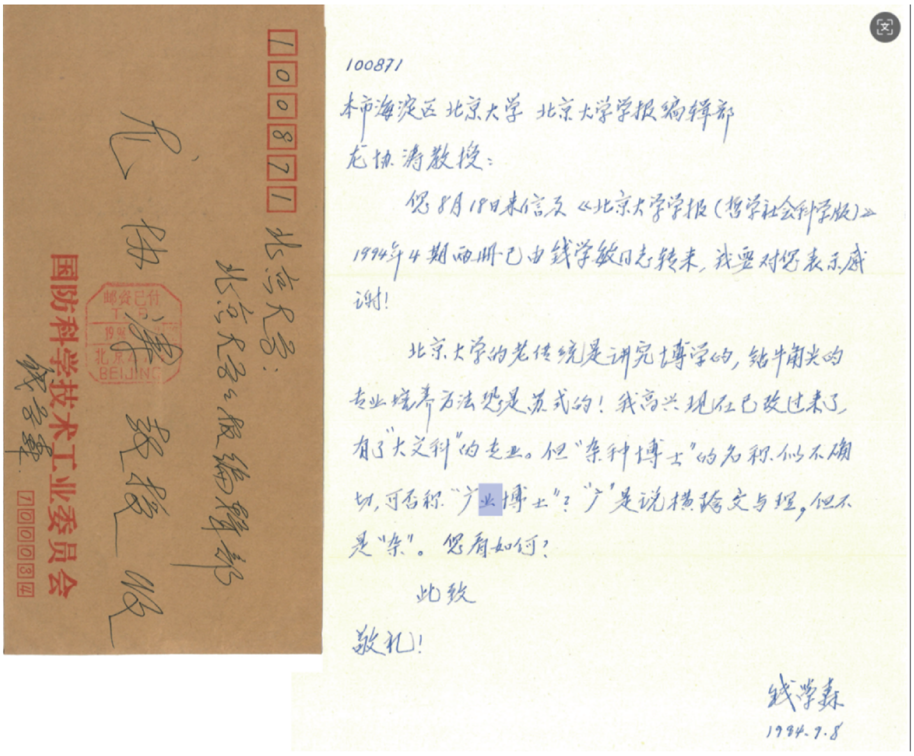
这三篇文章经过黄楠森、薛汉伟老师严格审阅,提了许多意见,有的是很重要的意见,王东都一一修改,我安排发表在学报 1994 年的第 4 期、第 5 期和第 6 期上。这在学报的历史上没有过,但当时社会反响很好。王东的第一篇论文,《福建日报》办的《每周文摘》在头版头条并且套红以《三位巨人和三面旗帜》为题予以转摘。当时台湾逸仙文教基金会理事长、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马树礼先生给我来信,表示完全赞同王东文章的观点。三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召开,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“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”,专门论述中国现当代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面的伟大人物:孙中山、毛泽东、邓小平。由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王东论文研究的问题具有的价值和意义。第二篇论文题目措辞很有新意,四十而不惑,中国历经磨难,终于找到现代化求索的不惑之道。《新华文摘》1994 年第 12 期予以转载,并且题目上了封面。第三篇论文研究改革、发展、稳定三者关系,的确是抓住了关键,在当时乃至以后都要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。

通过发王东的三篇文章,联系之前学报发曹凤岐的文章,我在工作岗位上边干边学,逐步体会到发文章、编稿子可以概括出三句话:在重大理论问题上要反映北大的声音,在学术探索和创新上要体现北大的水平,在编校质量和编排规范上要坚持北大严谨的学风。

我主持工作期间主要发北大学者的文章,但也发表了很多校外著名学者的文章,例如龚育之、高放、冷溶、李忠杰、胡鞍钢、邹东涛、周汝昌、曹道衡、钱中文等,还发表了港澳台和国外著名学者的文章,例如饶宗颐、周策纵、郑子瑜、李亦园、金耀基、兴膳宏、清水凯夫等。

在组织校外作者稿件中,我同著名科学家、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教授的联系,既感殊荣又留下遗憾。钱学森晚年提出大成智慧学,强调学科的综合集成,把各领域的知识融合起来形成系统性、整体性。正如他所言:“必集大成,才能得智慧。”今天看来,这是超前预判了人机协同的 AI 时代的到来。我看到钱老大成智慧学的价值与发展前景,千方百计想约请他为北大学报写一篇文章。当时又正值我校哲学系在赵光武教授的主持下,连续举办“现代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”研讨班。我很关注并参与这个研讨班的活动,先认识了钱老的妹妹钱学敏,并且在北大学报 1994 年第 4 期上发表了她的文章《钱学森的哲学探索》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于 1994 年 6 月 10 日、8 月 18 日两次给钱老写信,恳请他赐稿北大学报,并安排固定逐期给他寄赠北大学报。可能因为钱老年事已高身体不好、不能再写文章的原因,他没能给北大学报寄自己的文章,但他于 1994 年 6 月 15 日、9 月 8 日极其认真地亲笔给我回复两封信。我龙某人何德何能,值得钱老回信,主要是因为我代表《北京大学学报》这个刊物向他约稿。由此可见《北京大学学报》在钱老心中的分量。钱老的第二封信中有一段重要的话,推崇北京大学的“老传统”:

> 北京大学的老传统是讲究博学的,钻牛角尖的专业培养方法恐是苏式的!我高兴现在已经改过来了,有了“大文科”的专业。但“杂种博士”的名称似不确切,可否称“广业博士”?“广”是说横跨文与理,但不是“杂”。您看如何?



100871
本市海淀区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
龙协涛教授：
您8月18日来信及《北京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1994年4期两册已由钱学敏同志转来，我要对您表示感谢！
北京大学的老传统是讲究博学的，钻牛角尖的专业培养方法则是苏式的！我高兴现在已改过来了，有了"大文科"的专业。但"杂种博士"的名称似不确切，可否称"广业博士"？"广"是说横跨文与理，但不是"杂"。您看如何？
此致
敬礼！
钱学森
1994.9.8

“广业博士”,钱老给我们取了一个多么好的名称! 这个名称,代表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模式。北京大学于 2001 年成立了以蔡元培校长名字命名的“元培学院”,不分文理,注重学科交叉与融合,对本科教育模式进行创新探索,完全符合钱老的人才培养思想。这是可以告慰钱老的。

回想自己主持北大学报工作这段经历,的确很辛苦,但内心很充实。学报是我热爱的工作舞台,也是我学习知识、锻炼才干的书册课堂。自己因为有过北大学报工作的不寻常经历,又曾主持过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工作,我对大学学报的价值和意义,对编辑工作的苦和乐,有真切的感受和体会。我曾写过一篇《学报赋》,抒发自己对学报的认识和情怀。现在我写这篇回忆北大学报的文章,决定引《学报赋》中的一段话,作为此文的结尾:

学术乃天下之公器,文章为经国之大业;学人乃社会之良知,学报为学术之园圃。社会呼唤公正之学术,作者期盼慧眼之编辑。使命神圣,常令同仁担道义;目标高远,更使吾辈思奋发。年年滋兰树蕙,岁岁雕龙雕虫。弃瓦釜而淘金石,鄙门户而择公允。纳深山之清流,容大海之洪波。乘历史前潮后浪,淘思绪散金碎银。学理昭昭悬日月,激扬文字耀古今。担当精神创造,为民族立脊,为社会导航;崇尚理论探讨,展百家著述,播万里书香。精益求精,汗水酿思想甘露;锲而不舍,辛勤集精神琼浆。伏案审校,焚膏继晷,几多寻寻觅觅;援笔润饰,嚼字咬文,尽在圈圈点点。

（责任编辑　郭昌盛）